

得与失：作为社会空间再生产动因的城市重大活动

杨贵庆

得与失：作为社会空间再生产动因的城市重大活动

“城市重大活动”一般是指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带来重要影响的公共事件。在更多的语境下，这类重大活动一般是由政府组织、自上而下推动的，而且希望通过重大活动给城市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和推进。例如，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上海 2010 年世博会、西安 2011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等。国内如此，国际上也不例外。例如伦敦举办的 2012 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给伦敦城市东部地区的重建复兴带来了重大契机。总体来看，城市重大活动本身的国际化特征以及给城市所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甚至对一个国家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积极营销所带来的促进，使得城市政府乃至国家财政倾注力量予以运作。对此，著名的城市规划学者唐子来教授曾以“FACE”一词中的 4 个英文字母来形象地表述城市重大活动推进城市营销的 4 个方面。其含义大致如下：“F”代表了 Festival，即各种传统节日；“A”是 Activity，指各种主题活动；“C”是指 Celebration，即包括各种颁奖庆典；“E”是 Exhibition，是指各种展览展示。以上 4 个英文字母所形成的单词“FACE”正好又是“脸面”的意思，寓意了城市的一张“名片”。上述对“城市重大活动”这一关键词所作的创意性诠释，正是反映了当今以资本、技术和传媒等要素的全球化过程为特征的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转变。

之所以城市规划对“城市重大活动”予以关注，其中

较为直接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它们对城市空间环境和功能结构的改变带来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城市重大活动需要占用相当规模的城市用地，少则数公顷，多则也许几个平方公里。因此，重大活动其规划建设选址，可作为地方政府推进旧城改造、城市功能结构调整、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等实施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契机。尤其是在举办活动之后，场地、场馆的后续利用才是真正实现城市功能转型和空间优化的目的所在，从而实现城市长远的规划发展意图。例如，上海 2010 年世博会 5.28km² 场地的选址和永久性场馆的建设，推进了黄浦江在上海市区上游地段两侧的改造，特别是对于原来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用黄浦江岸线的现状，通过举办世博会，将一些工业生产岸线转变为城市生活岸线，加快了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和转型；同时，永久性场馆区将进一步规划建设成为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文化活动中心。这一城市级别的文化中心与以南京东路、外滩和浦东陆家嘴地区所形成的城市中央商务区遥相辉映，从而形成上海中心城区多中心、多极发展的结构。由此来看，上海世博会这一城市重大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上海大都市现代城市功能的重构，引领产业发展方式转型，推进了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这应该是较为睿智的“得”。

城市规划对“城市重大活动”予以关注，其中更为深层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它们对城市社会空间的改变带来深远影响。在这里，我们把“城市社会空间”定义为：城市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集体行为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城市重大活动通过对物质空间环境的改造，影响并重塑了新的城市空间环境，改变了不同社会阶层人群在空间上的集体行为，从而重塑了新的城市社会空间。这一社会空间重塑的过程，正符合 20 世纪法国哲学思想大师 Henri Lefebvre（亨利·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的要义。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是一个社会生产的过程，它不仅是

作者：杨贵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城市规划系副主任

一个产品，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他的论述揭示了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即城市空间的使用对象、服务人群。由于在一个特定的城市内部，城市空间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特定类型的城市空间由于其具有其相应的使用者或服务人群而具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因此，城市空间使用权利的公平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公平的本质。城市重大活动通过特定类型的空间再生产，重塑了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类型和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规划建设活动无法回避对于社会公平的考量。从空间公平到社会公平，这应该是城市规划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之一吧。

一项成功的“城市重大活动”，在规划建设方面应该体现出城市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优化的有机结合。在举办城市重大活动的名义下，城市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不以牺牲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为代价，反之，应通过利用改善物质空间环境的契机，来优化城市社会空间。例如，2012年伦敦举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选址于伦敦城市东部、泰晤士河下游北部的地区。此地区涉及的250英亩（约101公顷）是针对原有传统工业用地进行改造，并对周边贫困社区进行环境整治。在场地规划中，几处大型足球场地在赛后将作为生态居住社区中供居民种植水果和蔬菜的花园；可拆卸的比赛场馆和看台，便于在赛后将用地转型成为举办综合运动会的社区体育场，也可用来举办其他大型社区活动。伦敦市政府积极利用奥运会重大活动的契机，推动了伦敦城市东部旧区改造，通过对贫困脏乱地区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使得当地居民受到实惠，并且改变了伦敦人对于这一地区的原有的较为负面的认识，增强了这一地区的居住融合度，从而使得其城市社会空间品质得以提升。奥运会之后，该地区将成为大伦敦市城市空间东拓的有机组成部分，沿着泰晤士河的城市景观带也将得以东延，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将得以形成。这是城市重大活动推进城市物质空间改造和城市社会空间重塑的较好的范例之一。

然而，在不少情况下，城市重大活动成为“肢解”城市社会空间并使之隔离的助推器，从而造成了对城市空间使用的特权，远离了社会公平。例如，某些城市重大活动由于片面考虑美化城市物质空间环境，在重大活动所赋予的城市市政工程规划建设的名义下，对成片旧城居住区进行改造。改造之后的用途基本上是高档消费的场所，使用对象或服务人群是高收入的社会阶层，而原住民基本上被

高额消费门槛所阻隔。这种城市空间分异和隔离的过程，早在20世纪早期芝加哥学派的帕克、伯吉斯等人，就以“社会生态学”的方法予以了研究，即城市社会空间通过“隔离、侵入和接替”等过程，完成了社会富裕阶层对高品质城市空间资源的占用，即所谓的“绅士化过程”（Gentrification），从而形成了更多体现在居住形态和居住行为上的城市社会空间隔离。因此，一些城市重大活动的结果，尽管主观意愿很好，但客观上却导致了对低收入阶层的空间隔离、排斥，甚至是驱赶。在现代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重塑过程中，城市重大活动通过对城市空间环境的规划建设，由于片面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城市空间的新秩序被土地价格等因素“磁化”排列，而忽视了诸如历史街区的历史文化价值，忽视了日积月累的社会网络等方面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从而失去了城市社会空间再生产的社会公平之核心内涵。这应该是较为遗憾的“失”。

在快速城镇化阶段，城市重大活动作为城市社会空间再生产的主要动因之一，确实面临着重大考验。由于重大活动从决策到实施建设，往往时间短、规模大、任务繁重，而且有的时候建设资金也十分有限，要综合考虑错综复杂的因素，可能顾此失彼。然而，正是因为城市重大活动可能给城市带来的长远的后续效应，所以，有关城市重大活动的规划建设决策就更应该予以重视。从重大活动的规划选址，到实施活动阶段的安排，特别是对后续利用的综合考虑和潜伏设计，都应该谨慎而睿智。建议在进行城市物质空间环境改造的同时，充分重视原有城市社会生活肌理的多样化，重视原有城市日常生活的社会网络和活力，从而使得城市社会空间再生产的结果，既满足新的社会空间生产的需要，又反映出物质空间表象之后的社会公平。只有这样，才更能体现出城市空间规划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要义。

参考文献

- [1] 唐子来, 陈琳.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城市营销策略: 观察与思考[J]. 城市规划学刊, 2006(6).
- [2] 杨贵庆, 黄璞. 大城市旧住区更新居民住房安置多元化模式与社会融合的实践评析——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11(1).
- [3] 孙萌. 后工业时代城市空间的生产: 西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方法解读中国城市艺术区发展和规划[J]. 国际城市规划, 2009(6).